

东北亚研究丛书

东北亚历史问题研究

赵立兴 高福顺 张淑贤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东北亚研究丛书

东北亚历史问题研究

赵立兴 高福顺 张淑贤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DongbeiyiLiShiWentiYanjiu

东北亚历史问题研究

赵立兴 高福顺 张淑贤 主编

责任编辑:徐 潜

封面设计:魏克威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7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印数:300 定价:24.00 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626-609-7/G·268

序 言

民族是历史范畴研究的对象。人类经过漫长的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待到原始社会崩溃、阶级社会确立的时期，便产生了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诸特征的新的稳固的人们共同体，这便是民族。在这一历史时期，与民族相伴而来是国家，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密不可分。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问题都在发挥重大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凡是民族问题处理得好的，社会有安定、繁荣，是人民受益的积极因素。反之，就会引起政治的动乱，战祸不已，国家衰落，甚至分裂，人民就要受苦。总之，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研究民族问题，就成为建设国家的一个大的使命。

我国有 5000 余年的文明史，有足以令世人骄傲的古代文化遗产，而这些遗产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诚然，少数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汉族的帮助；同样汉族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民族的帮助。况且，汉族自形成之日始，就不是一个纯血统的单一民族，她是融合了许多部族而构建的民族共同体。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应该对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作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东北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占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东北民族的发展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自古以来，我国东北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区，早在四五千年之前，就相继形成了华夏、东胡、涉貊、肃慎四大族系，先后有数以百计的部族和民族在这块大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绚烂多彩的历史剧。他们是东北黑土地的开拓者，是文明的创造者，

是这里的真正主人，正是他们把社会不断推向前进。东北的历史，确切地讲就是这里的民族史，离开民族史就无所谓东北史。

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有的曾经割据一方，如诸燕、高句丽、渤海等等；有的曾占据中国半壁河山，如契丹、女真等等；有的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政权，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主宰者，如蒙古、满族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中华文明谱写了绚丽的篇章。

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政治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南下，这种状况与北方民族的发展不无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北的少数民族大批南下，而内地的汉族又持续不断地北上，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始终没有中断过。这种民族的对流，是加速东北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促进了各民族的联系与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促进了在政治上的连接与统一。

古代的东北是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致使这里的许多少数民族，能够很快地向中原的汉族靠拢，成为比较先进的民族，建立了民族割据的地方政权，发展了自己的民族经济文化，创造出本民族语言文字，有的很快由奴隶制进入到封建制的社会。北方的民族建立了许多政权和国家，但都以中央王朝为正朔，表现出中央文化的巨大向心力，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世界的古代和中世纪，都曾经形成过一些庞大的帝国，有的跨亚非、欧非两洲，有的跨欧亚非三洲，但是，他们在军事力量失败之后分崩离析了，崩溃之后再也没有能够形成往日的统一。只有中国自秦汉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中间虽然经过了两度大分裂导致南北对峙，然而每一次分裂之后都重新达到更高的统一，并终于在中国古代史上形成为巩固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种民族关系是与欧洲不同的，欧洲与中国领土差不多，有许多民族，语言相通，生活习俗也很相近，有过统一的时期，但

最终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中国民族复杂，语言和习俗差别很大，却始终保持着各民族人民相互依存、相安共处的民族格局。2000年来，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分裂的，而分裂的时期，都争相自称是中华的正统，为恢复中华的统一而奋斗。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都以是中国的延续而自豪，称自己是正宗。这种可贵的凝聚力，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个性。毫无疑问，东北的各个民族为缔造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应该大书而特书的。

研究东北民族史，对研究东北的疆域史有重要意义。国家疆域是历史上形成的，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有了国家才有国家的疆域和国境问题。国家疆域的形成发展，有其国内的各地区和各民族间的内在依据，通过民族的分布、历朝对东北各地的统治和有效的行政管辖，才能说明东北疆域发展的全过程，才能批驳在疆域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和政治图谋。我们要发扬边疆史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世人了解中国苦难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激发我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爱国主义的热情，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要时刻警惕在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华势力对我国的遏制及潜在的威胁。

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十分重视，东北历史的研究，尤以东北民族史和疆域史为重点，志向高远，奋发进取，深为感佩。今屡有大作问世，征序与我，实不敢轻易置喙，然盛情难却，爰缀予所知者书于次，以示敬怀。

刘厚生 谨识

2001年4月1日 于长春

前 言

东北亚系指亚洲的东北部,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 and 内蒙古东四盟、日本、朝鲜半岛(韩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阿留申群岛、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即整个环北太平洋地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大热点。东北亚作为世界自然地理区域之一,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有利的人文环境,在国际间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高,东北亚问题研究已引起世人瞩目。

在东北亚的区域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东北地区恰好处于“东北亚的腹里心脏”,它北面与俄罗斯接壤,南面与朝鲜半岛相伴,西面与蒙古毗邻,东面隔海与日本相望。由于中国东北地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东北亚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的枢纽。在历史上,东北地区就曾起到过这样的作用。自秦汉以来 2000 多年间东北亚的发展走向,大体上是“天朝天国”以今中国东北为依托,与东北亚区域内的诸多部族或地方政权之间实践着宗藩或朝贡的关系。这期间,东北亚实际上还构不成地缘政治区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东北亚地区真正成为地缘政治区域乃是 17 世纪中叶“由俄国向东北亚的扩张而引发的”,至 18、19 世纪才凸显出来。目前,东北亚地区的焦点问题很多,矛盾也很突出,摆在我们专家学者面前的任务异常艰巨,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将东北亚从“远东”的范围内区分开来,使之成为地缘政治的独立区域,应该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1975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R. A. 斯卡拉皮诺(Scalapino)的著作《亚洲及其前途》一书中首次将东北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独立区域。此后,他

又出版了《东北亚与大国关系》一书，该书虽然仅论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美苏中日四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政策和相互关系，但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本以东北亚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

在我国，有关东北亚的研究早在古代便已开始了，那时的研究仅仅是就东北亚的某一区域或某一民族的个案研究，真正把东北亚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研究应该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崔丕教授撰著的《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一书，该书立足于中国，强调了中国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还强调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区域关系的发展与欧洲的政治国际关系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并非“由欧洲决定的”。这为我们研究东北亚问题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随着东北亚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成立了研究东北亚问题的科研机构，许多专家学者已跻身于东北亚问题研究之中，从不同角度勾画着东北亚美好的蓝图。在这方面，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做得较为出色，他们约集了全国有志于东北亚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筹划、集体撰写，先后出版了《东北亚研究》、《高句丽、渤海考古集成》等多卷本、几千万言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亚研究的深入开展。东北亚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东北工作站”，旨在指导和协调东北三省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这对东北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为了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现将我所专家学者近年来所发表的部分成果汇编成这本论文集出版，旨在更好地推动东北亚的研究。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图保持原文的风貌，只对个别内容及体例做了相应的调整，几乎一仍其旧。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全书舛误之处一定不少，敬希专家学者教正。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能够顺利地出版，与长春师范学院的领导、科研处、财务处的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是密不可分的。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厚生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而且，刘先生还欣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感谢。吉林文史出版社副总编辑徐潜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亦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2001年5月15日于长春

目 录

【历史问题研究】

七世纪东北亚形势	姜维公	(1)
试论渤海初都旧国的过程及其原因	高福顺	(9)
从夫余、高句丽官制中的“加”看夫余玉文化		
与红山文化的关系	姜维东	(15)
隋唐时出使高句丽的两位使者	姜维东	(25)
《高丽记》所记高句丽官制体系的		
初步研究	高福顺 桑秋杰	(29)
历史上的盖苏文政变	姜维东	(42)
耶律阿保机托神改制与黄龙府名称的由来	姜维东	(51)
辽代生女真与高丽的隶属关系	高福顺 王 惠	(56)
乾嘉道时期的东北经济	魏克威	(70)
清中叶吉林的封禁与开发	魏克威	(79)
富俊与吉林的早期开发	魏克威	(87)
关于卫满的国籍问题	姜维公	(95)
论袁世凯与甲午中日战争	赫 坚 朱兴义	(103)
从“仇敌”到“盟友”的剧变		
——1905年~1907年日俄关系分析	张淑贤	(113)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苑宏光	(125)
谈宫崎寅藏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贡献	宋慧娟	(135)
中共满洲省委的撤销与中共代表团		
在撤销工作中的失误	苑宏光	(144)
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原因的探讨	苑宏光	(151)
试论中共“左”倾错误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危害 ..	苑宏光	(158)

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丧失	朱兴义 王婉玉 (166)
论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历次“左”倾错误	
对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严重危害	苑宏光 (173)
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对东北抗日	
统一战线指导作用述评	苑宏光 (182)
试论“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的反日斗争	苑宏光 (190)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对外战略	张淑贤 (200)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张淑贤 (205)
中国东北三省和沿日本海自治体的	
经济合作	赫 坚 张淑贤 (211)

【历史地理研究】

论东北古代城市的发展	高福顺 (219)
东疆古民族古地理述论	高福顺 (229)
汉魏南北朝时期东北水路交通开发述略···	高福顺 曹艳秋 (246)
隋唐辽金时期东北水路交通开发述论	高福顺 (254)

【历史文献研究】

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安东都护府	
记载的不同	姜维公 (262)
陈大德与《奉使高丽记》	李慧娟 (266)
《高丽记》成书时间及作者考·····	姜维公 (275)
《高丽记》校勘记·····	姜维公 (282)
《高丽记》的史料价值·····	姜维公 (292)
简论《高丽记》佚文在地理学上的贡献	高福顺 (298)
简论《高丽记》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	高福顺 (303)

七世纪东北亚形势

姜维公

七世纪初，大唐帝国建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恢复了正常的封建秩序，隋王朝的统治区全部为其接管，辽西地区自然也纳入到了唐的行政区划之内，但是辽东地区仍为高句丽所控制。在朝鲜半岛上除了高句丽外，还存在着百济和新罗两个政权。倭国在日本列岛上也逐渐强盛起来，并向朝鲜半岛扩张势力。七世纪的东北亚形势主要是在唐和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之间展开的，各政权之间在和平交往的同时，由于存在着利益之争，又使各国纵横捭阖，以致兵戎相见，使得东北亚的形势显得分外错综复杂。

一、唐和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法统观念，被历代帝王所遵循，自公元四世纪开始，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一直被看成是化内之民。唐建立后，这种隶属关系也被承袭下来。

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后，高句丽首先入贡称臣，恢复了因隋末战争而中断多年的臣属关系。唐高祖李渊本着“务共安人”的原则，^①无意收复辽东这块百余年前从中央集权下分离出去的土地，并打算放弃辽东。从朝臣的反映来看，这一想法显然是不符众望的，刚一提出就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中书侍郎温彦博说：“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②这样唐高祖只好打消了放弃辽东的念头。

公元626年，李渊第二子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以雄才大略著称于世的封建帝王唐太宗——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黷武主义者，他不赞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

点,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安置少数民族的办法,“征战和亲,无闻上策”,^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唐太宗以“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为主导,努力调和唐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关系。

首先,通过册封的办法,确定了君臣之位。武德二年(619),高句丽首先“遣使来朝”,^④武德四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同时遣使入贡,自此以后,“朝贡不绝。”武德七年,高句丽王建武遣使来请颁历,唐高祖利用这一机会遣使册封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⑤从而完成了对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册封,确定了三国对唐的臣属关系。虽然确定了臣属关系,但唐对三国并无经济剥削,三国只是以入贡的形式带上一二土特产,而唐回赐的东西要比这多得多。

其次,在处理唐与三国之间矛盾问题上,也没有轻率地动用武力。我们知道,辽东自古就处于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管辖之下,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多乱,高句丽乘机占领了这一地区。唐太宗即位后,就想把它重新统一到中央集权国家内。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发生内乱,这为唐太宗统一辽东提供了良机,然而唐太宗为了帝国的安全,考虑到山东地区经济凋弊,而没有趁此出兵。

第三,在处理三国之间的矛盾时,也本着和解的原则。三国自古以来就争战不已,做为宗主国的唐王朝,想尽量缓和三国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帝国东方局势的稳定。唐太宗也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因“有宿仇,迭相攻击”,^⑥为了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太宗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前往调解。三国在唐的斡旋下,虽然“内实相仇如故”,但畏于大国之威,也被迫表示顺命,停止了攻战。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弑主擅权,与百济和亲结盟,共同向新罗发起进攻。新罗在此危难之际,遣使向唐请求救援。唐太宗接到新罗报告后,并没有派大军进攻高句丽,进而统一辽东,而是提出了三套解救新罗的方案:“我以偏军率

契丹、靺鞨入辽东，而国可纾一岁，一策也。我以绛袍丹帟数千赐而国，至，建以阵，二国见，谓我师至，必走，二策也。百济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师数万袭之；而国女君，故为邻侮，我以宗室主而国，待安则自守之，三策也。”^⑦由于新罗使者不能作主，唐太宗只得命相里玄奘出使高句丽，进行劝谕，以免兵戎相见。相里玄奘到平壤时，盖苏文已率兵攻占了新罗两座城池，“高丽王使召之，乃还”。^⑧玄奘劝阻他不要进攻新罗，但盖苏文态度蛮横，并以收复被新罗侵占的土地为由拒绝唐朝的建议，继续进攻新罗。

在新罗处境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作为宗主国的唐王朝既使不想用兵辽东，也不得不出兵了。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分兵两路向高句丽发动进攻。战争爆发后，本来进行两面外交的百济，实际上已和唐断绝了关系，同高句丽结成联盟，据《旧唐书·百济传》载：“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二，乘虚袭破新罗。二十二年又破其十余城，数年之中，朝贡遂绝。”

由于百济对新罗的开战，实际上已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战场，唐军虽然给高句丽以重创，但并没有达到统一辽东的目的；而南战场的新罗，在百济的猛烈进攻下，接连丢城失地，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新罗只好遣使向唐求援，唐太宗命苏定方率兵2万进攻百济，然而由于太宗的病故，这支军队并没出动。

这场战争随着唐太宗的故去而告一段落，因为刚刚继位的高宗为了稳定内政，不想把战争继续下去，高句丽和百济由于战争中的损耗也显得精疲力竭，半岛暂时又恢复了平静。然而，高句丽于公元654年，再次挑起战火，“冬十月，王遣将军安固出师及靺鞨兵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⑨结果新城一战，高句丽惨败而归。第二年春，又与百济、靺鞨联合进攻新罗，攻占三十三城。新罗求救于唐，唐立即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最后，唐与新罗合力灭掉了百济和高句丽。

二、日本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关系

早在公元 200 年前,日本就把势力伸到了朝鲜半岛的南部,并设置了任那日本府,使新罗和百济都臣服于自己。公元 4 世纪,高句丽开始南下,对百济、新罗及日本构成了威逼之势,三国曾联合起来共同抵抗高句丽。到公元 6 世纪,形势发生变化,新罗逐渐强大起来,北拒高句丽,西掠百济,并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朝鲜半岛。日本政府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刻想着重建任那日本府。七世纪初,日本企图联合百济和高句丽一起进攻新罗,然而,日本的远征军在整装待发时,由于主帅来目皇子病死,而未能出动。

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和百济出于共同的目的秘密结成联盟,企图瓜分新罗。但是鉴于唐朝对三国的一贯态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两国合兵进攻新罗,势必遭到唐王朝的干涉,而单凭他们的力量是无法与大唐抗衡的。为了对抗唐朝,谋求日本的支持,同年 2 月,高句丽派人出使日本,受到了日本政府的盛情款待。从此以后直到 647 年,高句丽几乎每年都以朝贡为名出使日本,这无疑是想和日本达成对抗唐朝的同盟。一心想重建任那府的日本,也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马上派使者进行回访,然而,此时的日本国内矛盾十分尖锐,朝廷正忙于权力之争,根本无力插足半岛事务。尽管高句丽想同日本结盟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日本却对高句丽明确表示:“既往短而将来长”。^⑩从此两国关系极为密切。辽东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对此不可能袖手旁观。史书虽然没有日本直接出兵朝鲜半岛的记载,但是从唐太宗对新罗使者的话中,可以看出日本参与了战争。^⑪

公元 645 年,正当唐军进攻安市(今辽宁省海城县东南 15 里英城子古城)时,日本发生了宫廷政变,中大兄皇子打倒苏我氏掌握了政权,日本从此开始了有名的“大化改新”。通过改新,日本确立了天皇政体。虽然其国内仍不稳定,但在对新罗的外交政策上,已变得强硬起来。^⑫

唐高宗年间(650~683),日本为了控制新罗,派高向玄理出使

唐朝。^⑬高宗趁机下诏令日本救援新罗，日本当然不会从命，仍然继续其与高句丽、百济的联合。公元660年，唐罗联军灭掉百济，日本见此情景认为如果再不出兵，那么进占朝鲜半岛的企图将永无实现之日，因此，立即组织远征军出师朝鲜半岛，在白村江与唐罗联军相遇。经过激战，日军大败而归，从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公元670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

三、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早在战国时代，日本就有人到了中国。^⑭从东汉光武帝时起，日本倭奴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交往一直延续到晋初。泰始(265~274)以后，由于中原多事，中日交往中断，南北朝时，日本又开始与南朝来往，前后八次遣使来朝，后来又一度中断了联系。这一时期的交往，日本都是处于臣属地位，接受中国的册封。

公元598年，统一中国后的隋朝重新引起了日本的注意。日本为同隋建立起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关系，不断派官员出使隋朝。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使者，主要是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及典章制度，想通过仿效中国的典章制度进行改革。

唐朝建立以后，由于圣德太子病逝，苏我马子独揽大权。公元622年，从唐朝回来的留学生惠日建议“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名，应唤。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⑮但是，由于正忙于国内权力之争，他根本无暇考虑与唐建交问题。苏我氏把反对派排挤出朝后，才根据惠日的建议决定与唐通好。630年，派犬上御田锹和留学生药师惠日作为遣唐使到达长安。唐太宗对于倭国使者的到来极为欣悦，认为这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不仅体恤倭国远道，使其不必一年一贡，并且派新洲刺史高表仁随倭使赴日“持节往抚”。^⑯唐朝此次回访除了与日本建立政治关系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执行唐太宗的东方政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高表仁等同新罗使者一同抵达日本。这一时期，百济、高句丽和日本已对新罗形成合围之势，唐朝为了缓解新罗的

压力，在出使时携带新罗使者，向日本表明自己对新罗的态度。可是，没有“抚远之才”的高表仁，到达日本后，以大国使者自居，而日本则要坚持对等外交，这样就与前来迎接的倭王子发生了争礼事件，结果高表仁没有完成唐太宗交给的出使任务，而愤然归国。由于争礼事件的发生唐朝不但没有达到缓解日罗关系的目的，反而，加速了日本与高句丽、百济之间的来往，三国开始了穿梭外交。^⑦从此日唐交通中断达 20 年之久。

日本在大化改新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因此仿效唐朝的典章制度，吸收先进文化，已成为日本朝廷的热烈渴望，然而，由于争礼事件，日本不敢贸然遣使，只得通过“附新罗使者上书”^⑧的形式进行试探。653 年，日本派出了第二次遣唐使，这次出使的任务就是从唐国“多得文书宝物”。^⑨由于耽心遣使不能顺利到达中国，紧接着又派出了第三次遣唐使。第三次遣唐时回国时，正值新罗遭到百济和高句丽的联合进攻，唐虽然在北线牵制着高句丽，但是高宗惟恐日本从南面再进攻新罗，使其处于被动局面，他明知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不可能与其合作，还是让使者捎书日本，令其出兵援助新罗，这不过是向日本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使其不敢贸然进犯。日本经过“大化改新”后，国内渐趋稳定，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朝鲜半岛上。公元 659 年派出第四次遣唐使，此次不以吸收文化为主，而是肩负着某种政治使命。其到达长安后，正值唐高宗准备出兵百济之时，唐高宗接见了倭国代表团后，已经看穿了此次出使的动机，所以对其使者实行幽禁。如果仅仅是怕他们回国泄露机密，那从礼节上来讲，对于友好国家的使者，应该盛情款待，而不应“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西”，使其“困苦经年。”^⑩由此可以推断，日本已经参与了唐与高句丽、百济的战争。龙朔三年（663），日本派兵参战，白村江一战，唐罗联军大获全胜，“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⑪日军撤回本土，建筑工事防御唐朝的进攻。但是，唐朝根本没有进攻日本的打算，它希求日本在半岛问题上置身局外，因